

化比较优势为发展升势： 中国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刘 骞 乌 丹

摘要：比较优势直接投资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该国处于比较劣势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即对于投资的东道国，应该首先引进该国具有比较优势(但投资国已经或正在失去的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本文就目前中国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通过对中国利用外资现状的研究，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比较优势 边际产业 关键性生产要素 多赢格局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分工日益专业化，世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厂商均在寻求降低成本。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挖掘并发挥潜在的比较优势，吸收有利于这种优势发挥的外国资本与技术，实现经济的集约化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

比较优势理论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根据国际贸易比较成本理论以日本厂商对外直接投资(FDI)情况为背景提出的。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些产业是对象国家(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可使东道国的——由于缺少资本、技术、专利、经营技能等关键要素——未能或未能充分显现的比较优势得以显现并扩大，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对外贸易，实现经济的共同增长。也就是说，对于东道国而言，引进外资要以能挖掘、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为标准，吸收高质量的有效的互补性外资，实现本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优化。

目前我国引进外资，在规模上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并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引资国，但在外资的使用上暴露出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去面对呢？

一、我国的吸收外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非缺口性外资为外资引入的主要形态

非缺口性外资是以钱纳里(H.Chenery)和斯特劳特(A.Strout)的两缺口模型为参照，而相对缺口性外资提出的概念，也就是在一国并不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时的外国资本流入，是以投资低于储蓄为特征的国内资金相对剩余和有外贸盈余情况下引进的外资。以两缺口模型 $I-S=M-X$ 的公式作为国民经济的恒等标准，强调引进外资对于填补缺口即外力调节对于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平衡作用。但从我国引进外资的实践来看，我国的外资引入早已超出了两缺口模型下的填充缺口的范围(见表 1)。

表 1 我国利用外资与两缺口情况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投资(亿元)	6 444	7 517	9 636	14 998	19 261	23 877	26 867	28 564	29 546	30 702	32 255
储蓄(亿元)	6 954	8 135	9 912	14 319	19 895	24 876	28 326	31 309	31 939	32 345	34 787
储蓄缺口(亿元)	-510	-618	-276	564	-634	-999	-1 459	-2 745	-2 393	-1 643	-2 532
外汇缺口(亿元)	-510	-617	-276	564	-634	-998	-1 459	-2 745	-2 393	-1 643	-2 532
利用外资(亿元)	492	615	1 059	2 245	3 724	4 019	4 556	5 339	4 860	4 371	4 927
外资增长(%)	25.00	72.20	111.9	65.88	7.92	13.36	17.19	25.00	-9.08	-10.07	12.72
经济增长(%)	3.8	9.2	14.2	13.5	12.7	10.5	9.6	8.8	5.2	4.8	8.9

说明：储蓄 = 国内总支出 - 国内总消费。 外资为实际利用额，以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换算得出。 储蓄缺口 = I-S； 外汇缺口 = M-X。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计算得出。

由表 1 可以清楚地看出自 1990 年以来，我国引进外资呈现出以下特征：

(1)非缺口性投资居于主导地位。国内的投资水平远低于国内的储蓄水平，国际收支连年顺差有很大的外贸盈余。除 1993 年的两缺口为正以外，其他年份均表现为负值。在毫无缺口而言的情况下的，大规模的外国资金流入，不可避免地导致我国的非缺口性外资占绝对优势。

(2)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与两大缺口之间并不具有相关性。1991-2000 年 10 年间，我国储蓄缺口的负值和外汇缺口的负值分别为：12735 亿元和 12733 亿元，即尽管存在大量的资金闲置与外汇盈余，同期的外资引进却仍高达 35715 亿元。

(3)我国非缺口性外资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从 1994 年开始，我国的外资利用稳步增加。直到 1998 年，因受亚洲金融

危机影响,我国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出现连续两年的负增长,但200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又迅速回到原来的水平。

(二)有效投资不足,外资使用效率低下,对经济的贡献率低

以非缺口性外资为主的外资引入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可由外商企业产值的变动情况和外资增长与经济增长间的相关性分析得到体现(见表2)。

表2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比重的变化趋势和对工业总产值的增长贡献率

指标年份	三资企业工业产值(亿元)	三资企业产值增长率(%)	工业总产值(亿元)	总产值增长率(%)	三资企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	三资企业对总产值增长弹性	三资企业产值的增长贡献率
	(1)	(2)	(3)	(4)	(5) = (1) / (3)	(6) = (2) / (4)	(7) = (5) × (6)
1990	1 048	50.1	23 924	7.8	4.38	3.67	16.1
1991	1 573	64.8	28 248	18.1	5.57	2.77	15.43
1992	2 592	64.7	37 065	31.2	6.99	2.08	14.51
1993	4 269	74.6	52 692	42.2	8.10	1.53	12.43
1994	7 454	43.7	76 909	46.0	9.69	1.62	15.73
1995	10 714	11.8	91 894	19.5	11.66	2.24	26.17
1996	11 973	19.0	99 595	8.4	12.02	1.40	16.86
1997	14 243	33.1	113 733	14.2	12.52	1.34	16.73
2000	23 465	50.1	148 602	17.8	15.79	1.33	21.07

说明:为了排除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表中消去了1998、1999年的数字;2000年工业总产值由1999和2000年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总产值推得。

资料来源:通过《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1年)计算得出。

首先,三资企业对总产值的增长率弹性可以反映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增长速度与产值的增长速度的变动。从表2第(6)列可以看出:该指标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即相对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逐渐放慢,这也说明非缺口性外资在利用效率上的递减。

其次,从表1中可以看出,由于1990-1994年间外资引入的增长均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1993年的数字为111.99%,1992、1994年是72.20%和65.88%,所以在这些年份中,三资企业产值增长率较高并逐年递增。但从1994年以后的指标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外资引进在这些年份中的增长率在逐年提高,1994、1995、1996各年的数字分别为7.92%,13.36%,17.19%(见表1),但三资企业的产值增长率却在逐年递减,其中1994年为74.6%,1995年为43.7%,1996年为11.7%。这说明:1994年以前,三资企业产值增长率的递增是以很高的外资增长来支撑的,当外资的增长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时,我国三资企业的产值则在下降。这足以说明在我国引入的外资中,大量的外资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也不能产生高质量的产出,外资的利用效率普遍下降。

(三)在大力引进外国资金的同时,中国国内资本在大量流出

1990-2000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长期和短期资本流出合计为4219.42亿美元,接近同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4611.3亿美元),已超过了同期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3311.54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E&O)项目快速增长,累积数达-1298.94亿美元,这表明:中国在努力地吸引外资流入的同时,国内的资本却以各种方式流出——甚至外逃。这是国内投资渠道狭窄,投资转化效率低下的必然结果。这虽然扰乱了国内正常的金融秩序和外汇管理,但由于部分资本的外流在收益上使国内资本得到了补偿,降低了本应吸收这些资本的各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内资金大量闲置的问题,冲抵了一部分非缺口性外资的引入。

二、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非缺口性外资形成的原因

在1998年,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已高达42%(《中国经济时报》,2000-06-15),仅次于新加坡居世界第二位,但事实上中国的非缺口性外资的引进却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非缺口性投资存在直接根源是国内的高储蓄率与相对低的投资率,这与微观经济的低效率,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行有关。由于对国有企业的大量投入并没有使其潜在优势得以发挥,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均缺乏竞争力,导致大面积亏损。这样,一方面导致国有银行信贷使用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也使得投资变为有效产出这一过程受阻。于是就造成了大规模的储蓄负缺口,使大量资金闲置。在国有经济效率日益低下的情况下,为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只有依赖外资的流入来带动经济发展。然而,这样的非缺口性外资的流入,由于引入过程中的技术缺口以及在政策上的短视行为等因素的制约所造成的投资低效运行,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外资使用低效率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受到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的限制,但对中国而言,这两方面都不存在约束。实际上,约束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还有另外一种形式——技术约束:一国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管理经验及其配套设施,无法有效地吸收、利用各种资源,影响资源整体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发展应该是一种有效益、有市场的增长,尤其是要伴随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实现这样的经济发展,技术、专利及先进的组织和管理经验是比资金和外汇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也正是目前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由于中国微观经济的低效率,单纯引进技术难以消化吸收,必须通过外国资本的流入来引进技术。把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关键性生产要素与国内潜在的比较优势有机结合,才能产生出爆炸性的生产力,突破技术缺口的约束。但中国的外资使用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一点,造成外资使用同样的低效。各地方政府引资目标与引资行为的错位是造成外资低效率的一个主

要原因。地方政府在引资过程中,追求行政利益甚于追求市场利益,不顾自身经济条件与发展重点,忽视比较优势的把握,在配套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单纯追求技术设备的引进,一味扩大外资规模。这使得外资在运行中难以突破技术缺口这种限制,只能低效率运行。

(三)在大量吸收外国资本流入的同时国内资本大量流出的原因

首先,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国内微观经济的低效率。投资的低效运转直接导致了低的投资回报率,甚至是负回报。加上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全,投资渠道过于狭窄,国内资本无处可去,大量闲置,产生外流的巨大压力。

其次,政府引资目标与行为的错位也是造成资本外流的原因。国家为了弥补国内资金短缺,制定了一些“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流入,但是地方政府对政策理解和国家的初衷发生了错位——他们对外资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心理依赖作用:认为只要引进外资,本地区一切经济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于是不顾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管外资能否发掘本地区的比较优势;能否与外资部分形成优势互补效应;能否实现本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都不切实际、不计后果、不计成本地引进外资。一哄而上,以极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获取的外资纷至沓来。

三、我国外资引进中诸多问题在理论上与现实中的解决对策

(一)我国引进外资的必要性

W·里昂惕夫的研究表明:当一国经济增长率达到7~8%时,平均储蓄率和投资水平必须达到30%左右;而想达到9~10%或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一水平就至少应为35~40%。也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这可用图1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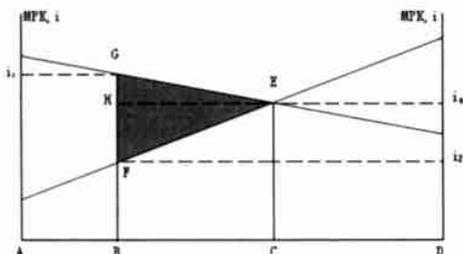


图1 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对各国福利的影响

在图1中,纵轴表示各国资本的边际产量或利率水平,这一指标同时又可表示一国的利润水平和资本收益率。横轴表示资本存量。在资本流动前,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存量水平为AB;发达国家的资本存量水平为BD。它们在各自的资本存量下的资本边际产量(MPK)分别为 i_1 和 i_2 。其中 $i_1 > i_2$ 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于发达国家较多,资本与劳动力两种要素之比较小,资本能发挥较大的生产力。当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BC的资本量后,两国的MPK水平均为 i_0 。发展中国家增加的总产品为梯形GECB的面积;发达国家减少的总产品为梯形FECB的面积;利息(或外资所要求的基本收益)为矩形HECB的面积。世界总产品增加为

三角形GEF的面积,其中发展中国家得益为三角形GEH的面积,发达国家得益为三角形HEF的面积。

但如前所述,在一个储蓄率已高达42%(1998年的数字)的中国,面对着大量资金的闲置和巨大的资本外流压力,引进外资还有必要吗?答案是:有必要。我们不妨用图2和图3,按两种假定情况来解释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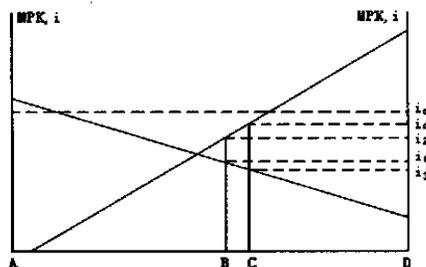


图2 失败的外资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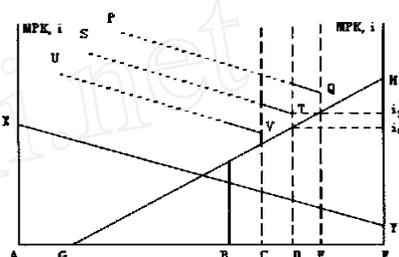


图3 成功的外资引入

就中国而言,因为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资金流入的效应有所区别:图2表示在资金大量闲置的情况下,盲目引资时世界各国经济获益情况。如图所示,在高储蓄率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资金存量较大,在图中表示为AB,发达国家表示为BD。两国的资本边际产出分别为 i_1 和 i_2 ($i_1 < i_2$)可以看出外国并没有失去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微观经济的低效率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拖累,把希望寄托在外资上,希望通过外资的流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由于资金引入的盲目性与无选择性,导致了外资流入后并未产生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上的升级;经济效率并未得到提高。如图,当外资引入量为BC时,国内的生产效率与资本的边际产出一起下降,国内MPK降至 i_3 ,外资对资本的收益要求是 i_4 ,那么外资为什么还会在东道国投资呢?这是因为外资可以从东道国的超国民待遇中得到补偿,假设最后它的收益率为高于 i_4 的利润水平 i_0 (如图2),则东道国的损失可想而知。这使得国内资本在低收益的不平等竞争之下不堪重负。这也是中国国内资本大量流出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国内资金大量闲置、微观经济效率低下的现实情况下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可由图3来说明。

如图3,东道国与投资国资本存量在资本流动前分别为AB和BF,东道国因为缺少技术、专利、管理经验等关键性生产要素,在其他方面的潜在比较优势得不到挖掘和发挥。国内资本的边际产品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当东道国在引资过程中,注重本国在资源禀赋上比较优势的挖掘,把资金的引入和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源引入有机结合起来,资本边际产出水平就会产生爆炸性的增长。如图所示,在外国资

本向东道国转移的过程中,生产率水平不断跳跃地提高。在资本以BD的存量向东道国转移过程中,东道国的生产效率线会由XY上移至ST,这是因为:一方面外资带来的关键性要素使得东道国在劳动力资源上的潜在优势得以发挥;另一方面由于关键性要素的引入也使得原来国内大量闲置或低效率利用的资金得到有效使用,从而带动整体资金使用的飞跃式提升,这点可由生产效率线的形状看出(图中假设资金分阶段投入,其间断点为可补性间断点)。即使在外资较高的资本收益要求 i_4 下,东道国仍可以从生产率的飞跃性提升中得益,因为这时的边际生产率为高于 i_4 的 i_3 ,并且边际产品线下的面积与外资的收益之间差额在不断扩大。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可以通过吸引外资克服国内资本利用的低效率,弥补有效投资不足,避免滞胀,推动经济增长。可见,这种可以填补中国比较劣势的资本(互补性资本)的引入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有效外资的引入不但使东道国获得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埋下强大的发展潜能,也使投资国的比较劣势得到了弥补,从而形成了一种正和博弈的多赢模式,这种国际化的多赢使得中国引进这种外资有了可行的依据。

(二) 中国引进互补性外资的可行性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蕴藏丰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在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

第一,中国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很低的劳动力成本,这为有效外资的引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利益驱动。根据1995年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工业劳动力已经达到1.47亿人,这一数字比西方7国的总和还要多6000万人。这为外资进入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国有大中型企业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进行企业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已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这使得下岗职工超过了1000万人,加上在传统体制长期实行低工资、多就业的国有企业中积淀的约20%的富余人员,政府面对的就业压力难以想象。所以政府除了妥善安排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救济以外,还会积极地利用优惠政策,大力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国厂商对华直接投资。

在政府方面,迫于就业压力和微观经济低效,政府盼望能借外国的资金增加就业,希望依靠伴随外资而来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生产效率。在外商方面,不仅中国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优惠政策会吸引外资的进入,而且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会使大量的外国资本垂涎。

第二,发达国家夕阳产业的对外转移需要接盘者,为互补性外资的引入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按照比较优势的基本原理,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夕阳产业)依次进行。这种投资与垄断优势理论中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在它的模式下,比较投资利润率与比较成本互相一致,而不是背离;直接投资方向与比较成本指示方向相一致,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继续保持生产规模,以外国的比较优势填补自身的比较劣势,从而重新获得竞争优势。它不排斥东道国对投资国所持的

特种技术、专利、关键设备的持有,而这一点恰恰是垄断优势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最惧怕的。所以对于东道国而言,通过引入互补性外资,获得在技术、先进设备、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整体提高是可行的。

发达国家夕阳产业对外转移的过程可由图4及图5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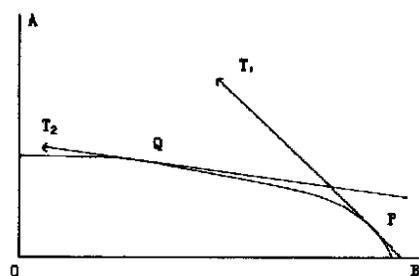


图4 发达国家生产可能性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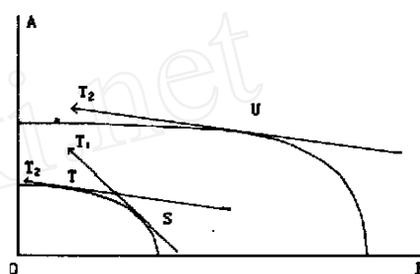


图5 发展中国家生产可能性曲线

图4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A,B分别代表两种技术含量较高的可贸易产品,纵轴表示产品A的产量,横轴表示产品B的产量。在初期,B产品经过改良、创新获得了较大的市场需求和较高的价格,这可以从商品交易线 T_1 较大的斜率看出。发达国家的生产点在P点。但随着A产品技术的不断完善,功能不断改进成为了后一阶段的消费热点,在A产品需求不断增加的推动下,A产品的价格开始上升。此时商品交易线由 T_1 逐渐移至 T_2 , T_2 较小的斜率说明了A产品与B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导致生产点由原来的P点向Q点移动。这时由于A产业的兴起与价格的上升推动了整个制造业工人工资的上涨,使得原来生产B产品的厂商面临较低的市场价格和较高的劳动力成本的双重挤压,不得不放弃B产品在其国内的生产,而把所持有的资金、技术、设备等资源以直接投资(FDI)的方式投放到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国家,以降低工资成本,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从而维持或扩大B产品的生产。

图5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同样,该国生产A,B两种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在初期,由于其国内缺乏关键性生产要素,对A,B两产品的生产只能维持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上;生产效率极低,劳动力资源不能发挥效能而大量闲置。A,B产品的相对价格决定其生产点——此时为S点。后期,在该国没有引进发达国家生产B产品厂商的对外直接投资时,其生产点移至图中的T点。在这一点上,东道国同样因为缺乏技术、专利权等关键性要素,仍只能在较小的产出水平下进行生产。然而,若东道国将B产品的生产从发达国家引入,情况则如图5中表示的那样:东道国的生产点将

由 T 点移至 U 点,这是因为关键性生产要素伴随着外资的进入渗透到生产领域,原来被隐藏的巨大的潜在的比较优势被发掘了出来,带来生产效率的飞跃式的提高,生产可能性曲线大幅度外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生产。此时,虽然商品交易线的斜率并未发生任何改变(U 点处的斜率仍等于 T 点处的斜率)。但由于工资成本的大幅降低扩大了获利空间,东道国仍可获得直接的收益。同时又提高了本国劳动力素质、产业技术水平,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综上,互补性外资的跨国界流动,无论在宏观资源合理利用上,在微观经济效率的提升上,还是在各国利益的分配上都是必要的,并且是可行的。这种互补性的资金流动建立起一种国际化的多赢的格局,这也正是推动互补性资本跨国界流动的能量之源。

(三) 比较优势理论实践的成功案例

格兰仕——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厂,占有全球近 30% 的微波炉市场,中国国内市场占有率接近 70%,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 40%。

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内的微波炉市场几乎被洋货垄断。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韩国厂商面临破产的压力,于是便不计成本地向全世界谋求发展,欧美企业纷纷对韩国微波炉反倾销,而后格兰仕进入欧美市场。由于人工成本较低,格兰仕的微波炉在欧美的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

随着反倾销诉讼的逼近,格兰仕开始了全球化的思考——格兰仕注意到:变压器作为微波炉的重要部件,日本产品是 20 多美元,欧美产品要 30 多美元。在日货面前,欧美企业坚持得很苦。格兰仕便与美方谈判,双方一拍即合。格兰仕提出:美方提供设备、技术,格兰仕负责生产,按美方现行产量每台支付 8 美元。就是说:美方不进行生产,每台也可盈利 8 美元。美方很快就把生产线运至格兰仕,格兰仕不费一枪一弹就把需花费高昂外汇的设备拿了来。如此,格兰仕又引进了日本的生产线。至 2000 年,格兰仕的产业链上有全球 200 家合作企业,成为了全球微波炉最大的生产车间。

格兰仕采取贴牌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 OEM)的生产方式,外销的微波炉中格兰仕品牌只占 40%。从其合作者角度来看,它们从格兰仕获得两层收益:一是租赁费,二是利用了格兰仕的销售渠道。那么格兰仕从何得益?格兰仕总经理俞尧昌解释到:OEM,在战略上,必须使外方得到可观的收益,否则他们就会设置市场进入壁垒,导致两败俱伤;在成本上,建一条生产线,需投资上亿,格兰仕可以不付现金;在生产上,格兰仕毫不担心定单和销售,规模的扩大可以使格兰仕操控生产利润。这都是比较优势的功劳!

格兰仕是化身自身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的成功者,其在 2000 年创汇 1.5 亿美元,为 8000 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加上关联企业 and 经销商,为几十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2001 年,格兰仕进军空调市场,也没有放弃这一模式。

(四) 对上述案例的理论说明

IT 产业在 20 世纪末的迅猛发展,网络、通讯和智能控制等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强大的市场需求给各大 IT 生产厂商带来的巨大的利润收益。像微波炉这样利润收益水平相对较低,技术含量相对不高的家电产品在发达国家便

逐步失去了它原有在技术上的比较优势。于是按照比较优势论的要求,发达国家便将该产业向国外转移以保持其原有的利润水平和生产规模。为了便于分析,假设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并未发生改变,其产品 A 与 B 的交易线(在图 4 中体现)由于需求的变化由原来的 T_1 变为 T_2 (其中 A 代表 IT 产品, B 代表微波炉)。由 A 与 B 产品比价的改变可以看出,原来生产微波炉的厂商因微波炉相对价格的下降造成其利润的减少,促使其降低成本以保持原有的利润水平,于是这一产业就向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比较优势的国家 and 地区转移。

对利用比较优势引进外资的中国而言,由于关键性技术和设备的引进,使得中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侧移动的过程中更加偏向微波炉的生产,在图 5 中 B 产品(微波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较大,这说明中国此时已经具有了生产微波炉的比较优势。尽管微波炉的相对价格下降(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中国与外国有同样的商品交易线 T_2),但由于这种比较优势,中国微波炉的生产点并没有左移至 T 点,而是向右移至较高的一点 U(见图 5)。这不但说明国内有生产如此之多微波炉的能力,也说明了国内厂商有生产微波炉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恰恰说明生产微波炉可以带来不斐的利润。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移和外资的引入所带来的可观的利润增长,恰恰是成功的外资引进的具体表现。

四、结论

我国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以缺口性外资为主要形态的外资引入;有效投资不足,外资使用效率低下,对经济的贡献率低;在大力吸收外国资本流入的同时国内资本大量流出等问题。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引资过程中对我国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的忽视或不够重视,引进外资后并未使由于互补性资金、先进技术、关键设备等要素的缺乏而被埋没的潜在比较优势得以发掘。中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在激烈的竞争中,除了应该迅捷地把握世界市场的机遇外,更应该从自身的比较优势考虑,挖掘并发挥本国在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利用与外国生产成本上的差距取得竞争优势,并挟比较优势建立国际化的多赢格局,实现经济的共同发展,化比较优势为发展升势。

参考文献:

1. Kiyoshi Kojima, 1978, Japanese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New York: Praeger Press.
2. 杨大楷:《国际投资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 尹翔硕:《国际贸易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 华民:《国际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5. 胡剑平、温娜:《国际资本流动的双缺口效应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载《投资研究》,2000(9)。
6. 卢汉林、王晓川:《论我国非缺口型外资的经济影响与对策》,载《投资研究》,2000(2)。
7. 张庭宾、刘国华:《从你死我活的满世界竞争对手到中外双赢的全球化合作伙伴——格兰仕与“八国联军”化敌为友》,载《21 世纪经济报道》,2001-03-26。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Q)